

臣民还是公民

——教科书审定制度和思想道德教科书（1902—1949）

吴科达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阅读近代



013068363

臣民还是公民

——教科书审定制度和思想道德教科书（1902—1949）

吴科达 / 著



G632.3
13

G632.3
13



北航 C16760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臣民还是公民? ——教科书审定制度和思想道德教科书:
(1902—1949) / 吴科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61-1914-3

I. ①臣… II. ①吴… III. ①中小学—教材建设—研究—
中国—1902—1949 ②思想品德课—教材建设—研究—中国—
1902—1949 IV. ①G632.3 ②G63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11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胡旭伟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6.75
插页 2
字数 580千字
定价 8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言	鲁迅的愿望	1
	一 教科书和教科书制度	1
	二 古代学校的教材及其管理	3
	三 本书内容素描	8

上篇 教科书审定制度

第一章	清末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12
	一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建立	12
	二 审定教科书的机构、范围和具体程序	22
	三 教科书的审定标准	24
	四 教科书审定实际情况分析	30
第二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37
	一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演变	37
	二 审定教科书的机构、范围和具体程序	54
	三 教科书的审定标准	62
	四 教科书审定实际情况分析	74
第三章	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78
	一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重建	78
	二 审定教科书的机构、范围和具体程序	93
	三 教科书的审定标准	101
	四 教科书审定实际情况分析	113

第四章 教科书审定制度：个性的束缚	122
一 教科书审定与学生个性发展.....	122
二 市场竞争与教科书质量.....	124
三 教科书制度与民主社会.....	128

下 篇 思想道德教科书

第五章 修身教科书	136
一 修身课程的设立和变迁.....	136
二 清末的修身教科书.....	137
三 民国时期的修身教科书.....	151
四 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修订：从清末到民国.....	183

第六章 公民教科书	189
一 公民科的设置及演变.....	189
二 北京政府时期的公民教科书.....	192
三 南京政府时期的公民教科书.....	210

第七章 党义教科书	243
一 党化政策和党义（三民主义）科的设置.....	243
二 党义（三民主义）教科书.....	244
三 党义（三民主义）教科书的影响.....	270

结 语 什么是教育?	274
一 受教育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	274
二 作为权利的教育.....	277
三 基于理性的教育.....	280

附 录	286
表1 清末学部教科书审定禀批与提要简录	286
表2 清末学部审定小学、中学及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	336
表3 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审定批语	344
表4 北京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目录	434
表5 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审定情况	495
表6 袁世凯时期小学、中学与师范学校修身教授要目	542
表7 袁世凯时期小学修身教科书编纂纲要	546
表8 壬戌学制小学和初中公民课程纲要	548
表9 南京政府时期（1933年2月）小学公民训练标准	551
表10 南京政府时期中学公民课程标准	563
表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中有关公民 知识的内容规定	577
主要参考文献	581

导言

鲁迅的愿望

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

——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1933年，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的短文里提出了上述愿望。此外，他还尖锐批评了中国现代教育30年来的变化无方：“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30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①本书将要研究的恰恰就是鲁迅那个年代的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制度和思想道德教材，这或许算是对鲁迅当年愿望的部分回应吧。不过作为开场前的序幕，首先还是对一些基本概念、中国古代学校的教材与管理以及本书的主要内容等，做个简要的界定和勾勒。

一 教科书和教科书制度

“教材”、“教科书”和“课本”这几个词，在现行的几种汉语词典里的解释都有出入，而且许多都不是很准确。“教材”在《辞海》里的解释

^① 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编注：《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卷，第271页。在篇首引用的那段话中，“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是鲁迅取笑讽刺当时历史学家顾颉刚的。顾颉刚1923年根据《说文》关于“禹”字的解释，推测禹最初大概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意在证明禹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文字学家钱玄同不同意顾颉刚根据《说文》而对禹的推测。1926年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承认对禹的推测是错误的，但仍然认为禹最初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参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柳翼谋先生》，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3、227、67、69页）。在1935年的小说《理水》中，鲁迅依旧在挖苦顾颉刚的这个推测（参见《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第385—407页）。

是：“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材料。”在《汉语大词典》里的解释是：“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际需要，为师生教学用而编选的材料。”^①这两个解释都强调了教材是根据教学大纲而编写的，即先有教学大纲后有教材。而实际上，教学大纲与教材之间并没有那种鱼水相连的紧密关系，教学大纲并非一定早于教材而出现。我国晚清时期的学校教育中，就一直没有所谓的教学大纲。因此，本书认为只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里“教材”的定义最为准确，并且采用这个定义，即教材就是供教学用的材料，包括教科书、讲义、参考资料、录像、图片，等等。^②

“教科书”和“课本”两个词，在多数词典里都被当做同义词。“教科书”在《辞海》里的解释是：“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教学和学生用书。”^③在《汉语大词典》里的解释是：“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专门为学生上课和复习而编写的书。”^④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里的解释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供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的正式课本。”^⑤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⑥这些解释首先存在上文同样的一个问题，即预设编写教科书之前一定要有所谓的教学大纲。其次，为教师讲授需要而编写的、详细解释每一课内容及其教学安排的教学参考书，是否也属于教科书呢？这些词典里的解释既不一致，也显得模糊。为了弥补这些解释的不足，本书给出的定义是：教科书是在教学过程中，供师生分别教授或学习的基本用书，既包括师生用的课本，也包括仅供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它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获取基本知识的重要来源。

很显然，在这里笔者将“教科书”与“课本”做了细微的区分，把“课本”仅仅限定为除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之外的教科书。此外就这两个词的起源来看，“教科书”可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学的传入和新式学堂的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9页；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5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页。

②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61页。

③ 《辞海》（缩印本）第819页。

④ 《汉语大词典》第5册，第448页。

⑤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661页。

⑥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1页。

创办而出现的一个新词。“课本”一词的出现时间应该早于“教科书”，它除了“教科书”这个意思之外，还有“国家规定的正税”和“试卷”两个含义。^①用“课本”一词来指称“教科书”，估计与“教科书”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与“课本”相近的还有另外一个词“课册”，指“书本”、“课本”。例如，南宋人陈善在《打虱新话·文章夺胎换骨》中有言：“其后东坡跋姜君弼课册亦云：‘云兴天际，歛若车盖。’”^②

教科书制度是指教科书编纂、发行、审定以及选用的相关规章和运行机制，是一个国家为保证国民接受一定程度的基本教育而实行的一项公共教育制度。根据教科书编纂、鉴定和选用主体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自由制、国定制和审定制。教科书自由制就是教科书由政府之外的民间机构自由编纂、出版，各个学校自主选用的一种制度。教科书国定制则是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制度安排，它要求各个学校统一使用由政府部门直接编纂、发行的教科书。教科书审定制介于前两者之间，它要求民间编纂的教科书必须经过政府部门或政府认可的权威机构鉴定合格之后，才能发行和选用。^③中国现代的中小学教科书都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审定的，与之相应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也是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而建立起来。1901年，晚清政府仿照外国的教育制度，将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高等、中等和初等学堂，开始了我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随即规定自行编纂的课本须由京师大学堂审定，相应建立了这种由政府部门鉴定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此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中央政权虽屡屡变更，但是教科书审定制度却一直沿袭到了1949年。如同没有“教科书”这个词一样，中国古代也同样没有明确、专门的教科书制度。

二 古代学校的教材及其管理

根据儒家的记述，中国古代的学校由小学和大学组成，不同于由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组成的现代教育体系。儿童大约在虚龄八岁进入小学，完成

① 《汉语大词典》第11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② 同上。

③ 有学者还根据鉴定教科书主体的差异，将这个制度作了细分：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对教科书的鉴定才称为“审定”；民间权威性机构的鉴定则称为“认定”。参见沈晓敏《世界各国教科书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注释①，《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9期，第66页。

小学课程之后，大约在虚龄十五岁进入大学。^①这种入学年龄规定虽然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相仿。古代学校的教材大概有三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在孔子诞生之前，后来作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献典籍，就已经文本化并且普遍用于教育，算得上最早的传统教科书。孔子随后系统地整理和编订了这些文献资料，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和课本。自汉武帝将儒家学说树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后，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就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校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儒家经典的注疏随着时事的变化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汉代儒生在解释和传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师法和家法，这些按不同师法家法传授的儒家经典就相当于不同版本的教科书。^②汉章帝在公元79年还召集经学名师聚会白虎观，讨论不同流派对儒家五经的解说，编写出了《白虎通义》，作为钦定的正统注解。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朝廷对于当时不同版本教材的一次审查和统一，对官办学校的教育有很大影响。东汉后期，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的注疏更有影响，后来虽然社会动荡、南北经学不同，但是直到唐代，他们的注疏都是学校里的主要教科书。为了更好地消除各地在解释儒家经典上的分歧，唐太宗曾于638年下令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撰一部正统的儒经注解，653年唐高宗颁行了这部《五经正义》。此后一直到宋朝前期，这部书都是官办学校的统一教科书。1227年，一直在私学中不断发展的理学被南宋朝廷选定为正统思想后，理学家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仪礼经传通解》、《通鉴纲目》，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春秋传序》等著作，^③陆续全面地进入官办学校，成了当时的法定教材。元明清三代

① 《大戴礼记·保傅》。

② 当时传授《尚书》的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等多家，传授《诗》的有申氏、辕氏、韩氏等，传授《礼》的有后氏、大戴氏、小戴氏、庆氏等，传授《易》的有杨氏、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等，传授《春秋公羊传》的有公羊氏、严氏、颜氏等，传授《春秋谷梁传》的有尹氏、胡氏、申章氏、房氏等。传授《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的有刘歆、贾逵等人。参见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范晔：《后汉书》志第二五《百官志二·太常》，卷三六《贾逵传》。

③ 《西铭》是张载汲取《易经》思想而阐发忠孝思想的理学著作。《大学》和《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两篇，宋朝初年开始从《礼记》中抽出来作为独立的儒家经典。随后，宋代的儒生纷纷为其注疏。直到朱熹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列注解以阐发理学思想，终于形成了以四书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参见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官办学校的教材基本沿用了程朱理学的著作。

识字、习文等童蒙教材是中国古代学校教材中的第二类。先秦到两汉的童蒙教材以识字为主要功能。我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是春秋战国之际东周王室编写的《史籀篇》。^①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童蒙教材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篇》，其将2000多个常用字编为三言、四言或七言韵句，介绍姓名、物品、官爵等日常生活知识。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流传甚广，直到唐代都是主要的识字课本。^②魏晋到隋唐五代是童蒙教材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童蒙教材的识字功能开始减退；另一方面知书而达礼的教化功能不断增强，宣扬伦理道德和传授历史知识开始成为主要内容。《千字文》是魏晋时期最有影响的课本，用一千汉字以四言韵语的形式，叙述了天地自然、社会历史、日常人伦等内容。既明快流畅，又富于教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了蒙书的典范，此后逐渐取代了《急就篇》而广为流传。唐代李翰的《蒙求》（《李氏蒙求》）和胡曾的《咏史诗》是两本侧重传授历史知识的重要教材，到明代还用作小学课本。宋代以后，童蒙教材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童蒙教材在内容上开始浸润理学思想，在形式上门类齐全、功能细化、数量繁多。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以及清代学者王筠的《文字蒙求》等，都是重要的识字课本；宋代王殷范的《续蒙求》、黄日新的《通鉴韵语》、王令的《十七史蒙求》，明代李延机的《五言鉴》^③、程登吉的《幼学须知》^④，等等，都是文史知识教材；元朝的《对类》^⑤、《千家诗》^⑥，明朝司守谦的《训蒙骈句》、兰茂的

①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史游：《急就篇》，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

③ 《五言鉴》，明朝李延机编撰，明朝张瑞图和清朝邹圣脉曾予以增订，后又名《鉴略妥注》。全书以五言韵语，概述了自上古至明代的历史发展。

④ 《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幼学求源》等，明朝程登吉编撰。清代邹圣脉注释增补后改名《幼学故事琼林》，简称《幼学琼林》。

⑤ 该书已失传。现存最早的属对课本是明朝吴学勉的《对类考注》和屠隆的《缙绅对类大全》，两书都介绍了一些做对子的基本原则和音韵知识。

⑥ 《千家诗》在清代蒙学中广为流传的版本，是由题名刘克庄或谢得枋选编的五言诗和题名王相选编的七言诗合订而成。最早有千家诗之名的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该书旧题“后村先生編集”，又称“后村千家诗”，即将该书归为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门下。但据今人考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由民间普通文人编纂而成，大概成书于元代。因此，清代蒙学中广为流传的《千家诗》应是民间文人编纂修订而成的作品。参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声律发蒙》，清朝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等等，都是音韵属对和诗赋教材。清朝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姚鼐选编的《古文词类纂》等书，都是教授儿童阅读作文的教材；宋朝吕本中的《蒙童训》、邵筭的《孝悌蒙求》、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小学之书》、陈淳的《启蒙初诵》、程端蒙的《性理字训》，^①元朝的《二十四孝》，明朝的《小儿语》、《昔时贤文》，^②清朝李毓秀的《弟子规》，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伦理政治教材。

在这些童蒙教材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通常合称为“三、百、千、千”，一直到清末都是最受欢迎的小学识字课本。清人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第七回里描写的一个书店掌柜，都夸耀说：“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1994年，新加坡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丛书予以推广。《二十四孝》和《弟子规》是最有影响的儿童伦理道德教科书。《二十四孝》是我国古代24个孝贤人物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在宋元时期就很流行，元朝人郭居敬将其辑录在一起，赋以诗文，训教童蒙。^③到明代还配上了图画，流传十分广泛。《弟子规》以《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话为提纲，具体地解释和阐发了儿童在家、出外、待人、接物和学习上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这两本教科书直到20世纪上半叶都是通俗的儿童伦理读物，当时新式学堂里修身教科书的一些课文都取材于此，对于普及儒家道德思想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中国古代学校的第三类教材是专业技术教材。东汉末年，爱好文学的灵帝刘宏为了自己的兴趣，在京城鸿都门旁开办了鸿都门学，招收擅长尺牍、辞赋和鸟篆的士人。这是我国第一所文艺专业学校。从此以后，一些专业技

^① 刘清之、陈淳和程端蒙三人都是朱熹的学生。《小学之书》由刘清之和他的老师朱熹共同编纂；《性理字训》首先由程端蒙编纂，南宋末年理学家程若庸予以了增补。

^② 《小儿语》，明朝吕得胜编撰。顾名思义，全文以近于儿童口语的浅显文字编写，在体裁上富有新意。《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推断其成书最迟在万历年间。后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增编，又称为《增广昔时贤文》或《增广贤文》。

^③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六《处士郭先生居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史部》218《传记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64页。

术著作逐渐成为了这类学校的教科书。各个朝代开设的专业学科差别很大，采用的教科书也各不相同。例如医学，唐代的教科书为《新修本草》、《黄帝内经》、《甲乙经》、《脉经》等；宋代则是《素问》、《难经》、《脉经》、《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三部针灸经》等书。

古代朝廷对于学校教材和教学内容的管理和控制通常有四条途径：一是选用某种儒家经学注疏直接作为官办学校课本。例如在宋代，宋神宗为统一思想、推行变法，就选用了王安石的经学注疏。王安石主持编写或注疏的《三经新义》（解释《周礼》、《诗》和《书》三经）、《易义》、《礼记要义》、《论语解》、《字说》先后都成为官办学校的经学教科书，“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①。到了嘉定年间，特别是在宋理宗表明自己仰慕朱熹、信奉理学之后，朱熹、周敦颐、张载、程颐等理学家的著作陆续被选定为官学教材。

二是朝廷直接编写官办学校教材。东汉太学的学生为一争名第高下，常常在考试中互相攻击他人的答卷不合某家经学的章句，有的甚至行贿篡改收藏于兰台的漆书经文以符合自己的答卷。为此汉灵帝诏令蔡邕等人校订经书，并于熹平四年（175年）开始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等今文经学五经以及《公羊传》和《论语》，刻于石碑立于太学，史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既是统一的考试标准，又是统一的官修教科书。与之类似，此前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后来唐代的《五经正义》和“开成石经”等，都是政府组织编写官学教材的典型案列。除了这些宏大的经学教材之外，皇帝有时甚至还参与蒙书的编纂。著名的《千字文》，传说就是梁武帝为教诸王识文习字而编写的。殷铁石受命在王羲之的遗书里选拓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交由周兴嗣编排成韵。周兴嗣连夜编就了这本《千字文》，第二天呈进给梁武帝时鬓发都变白了。^②

第一条途径比较类似于现代的教科书审定制，第二途径类似于教科书国定制。第三条途径则是任命合乎朝廷口味的儒生为官学教师。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书籍的撰写和流通十分困难，一些知识技艺和思想观点的传播常常依靠学者们的口传心记，因此，任命谁为学校的教师，实际上就等于选择某个学派的观点做了学校的教科书。汉武帝为尊崇儒术，即位后就罢免了诸子传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7，熙宁五年八月戊戌注；卷276，熙宁九年六月己酉。

② 李焘：《尚书故实》，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记的几十个博士，专门设置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①当时对于官学教师的授课内容似乎也特别严格。兼通数家之说的张玄，因策试第一而被任命为太学“颜氏春秋”的博士，但几个月后，学生告发他还讲授“严氏春秋”、“冥氏春秋”，不宜担任“颜氏春秋”博士，光武帝随即撤销了他的博士职务。^②

四是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控制学生。例如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弟子职》、1382年朱元璋颁布的《学校禁例十二条》、1652年顺治帝颁布的《训士卧碑文》，等等。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规章制度在赋予或是剥夺学生应有权利方面，虽然各有轻重多少的不同，但是都共同强调尊敬老师、听从老师的教诲。而老师特别是官办学校的老师，又是由朝廷选任的，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学校的课程内容的灌输。

上述的几条控制途径虽然主要针对官办学校，但是官办学校的课程内容通常也是整个社会仕选或考试的标准，因此，私立学校的课程内容同样受到约束，与官办学校并没有太大差别。总之，通过这些措施以及教育之外的选官制度、考试制度、文字狱等政策，古代朝廷还是有效地实现了对于整个学校教材的审查和控制。

三 本书内容素描

上文简略而又显多余地回顾了古代学校的教材及其管理，无非希望给阅读本书的读者呈现一幅粗略的背景图。那些拥有这些背景知识或者不想做通盘了解的读者，当然可以跳过这些内容而进入正题了。首先看本书的正标题“臣民还是公民？”。“臣民”，按照通常的解释，是指君主国家的臣子和百姓。以往君主专制国家的臣子和百姓可以称作“臣民”，现代君主立宪国家的官员和百姓依然可以称作“臣民”。区别的就是，现代君主立宪国家的“臣民”，根据国家法律享有公民权利并承担公民义务。也就是说，现代君主立宪国家的“臣民”也是“公民”。因此，臣民还是公民？自然有四种答案：臣民而非公民，公民而非臣民，既是臣民又是公民，既非臣民又非公民。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某种现代化的趋势和心态。但是仅

^①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范晔：《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

就道德价值和思想观念方面而言，作为传统意识形态（ideology）^①的儒家思想倒确实应该转向或者让位于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古代帝王“建国君民”^②手段的教育也应该转变而服务于拥有天赋权利的个人，帮助人们明白甚至实现自己的权利与发展。即让个人成为公民而非臣民，或者既是臣民又是公民，都是现代教育两个合适的选项。然而，晚清建立起来的我国现代教育，直到1949年之前似乎都没有排除另外两个选项，总是在那徘徊不前、飘忽不定。

本书的副标题“教科书审定制度和思想道德教科书（1902—1949年）”，点出了主要的研究内容。上篇教科书审定制度，详细地梳理和分析了晚清、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审定制度的演变和教科书审定的具体情况；下篇思想道德教科书，探讨了在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约束下，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小学修身、公民与党义三门课程的教科书。教科书审定制度能提高教科书的质量吗？修身教科书是否就是传统儒家经典的翻版？党义课又学些什么呢？……在您耐心地阅读之后，有些问题或许依然没有答案，但肯定会引起您的思考。“思想道德教科书”中的“思想”一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意思。笔者想从这些教科书的变化，窥探当时社会整个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或许您也有同样的好奇，但是提醒您不要失望的是，这些不断变化的教科书所表达出来的灵魂，有时候是如此的相似。最后的结语，是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教育的宏观思考。心急的读者可以从这里开始。

本书的研究，并不指望达到鲁迅的期望，建立“不在禹下”的功德。但是，大禹果真如鲁迅一直嘲讽顾颉刚的那样——是一条虫的话，那么笔者的功德“当不在禹下”，因为笔者至少是条会思考的“虫子”。

① 所谓“意识形态”，是指那些能够为政治制度、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及其运行提供依据和方法的观念体系。Cf. Martin Seliger,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Ltd., 1976, pp. 119-20.

② 《礼记·学记》。

上 篇

教科书审定制度
